

“阳安布”小议

李 光 明*

■ 内容概要 ■

出土于河北、京津地区、内蒙古、辽宁、韩半岛北部地区的战国时期青铜货币当中，有一种钱文左为“阳”，右为“安”的双字布币。此类布币的国别有“三晋”布币与燕布之分。“三晋”布币多为三孔方足布，从器形和钱文书法来看，燕国布币均有别于“三晋”布币，本稿仅针对该类燕国布币作一探讨。目前对于该类布币存在着到底为“安阳”布，还是“阳安”布的争议。

本稿通过对地望问题的比较、钱文读序问题的考论、国别定性问题的探讨等，指出以往将该类布币称为“安阳”布的依据并不充分，较为牵强。并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客观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具体的分析与考辨，认为将之称为“阳安”布是较为妥当的。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燕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于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对于燕国向东北地区的扩展及统治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战国时期、燕国、方足布币、阳安、安阳

■ 目 次 ■

- | | |
|----------------|-------------|
| I. 绪 论 | IV. 关于铸币地问题 |
| II. 关于地望问题 | V. 结 语 |
| III. 关于钱文的读序问题 | |

I. 绪 论

出土于河北、京津地区、内蒙古、辽宁、韩半岛北部地区的战国时期青铜货币当中，有一种钱文左为“阳”，右为“安”的双字布币。对于该钱文的释读多有不同见解，如张崇懿的《钱志新编》¹⁾释此布为“途阳”，马昂的《货布文字考》²⁾释为“宓阳”，初尚龄的《吉金所见录》³⁾中释读为“陶阳”等，目前学界多认

* 中国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lgm-88@naver.com

1) 张崇懿，《钱志新编》，1830（清道光十年）年酌春堂藏刻本。

同为“阳”字和“安”字。

到目前为止，此类布币的国别有“三晋”布币与燕布之分。戴志强与戴越就明确地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① 相对于“三晋”方足布，燕布的布身束腰比较明显；② 燕布钱文书法自成一体，文字笔划不如“三晋”布的钱文刚劲流畅，字体略显圆浑，与“三晋”两周的文字有明显区别；③ 含铅量比中原地区的布币高得多，甚至铅含量会超过铜的含量，这是战国燕铸钱币的普遍特点；④ 制作相对粗糙。认为燕铸方足布，是受“三晋”方足布的影响，同时又保留了燕地货钱文化的某些传统。④

从器形和钱文书法来看，燕国布币均有别于“三晋”布币，尤其是该类布币“三晋”多为三孔方足布，比较容易辨别，故本文仅对该类燕国布币作粗略探讨。虽然对钱文的释读已初步达成了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该布币到底为“安阳布”还是“阳安布”的认识还存在分歧。

II. 关于地望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燕国布币的钱文多因地名而得。当然也有例外，如“右明新治”钱文。但绝大部分燕国布币的钱文确实是因地名而得也是不争的事实，如襄平布、平阴布、宜平布、阳坪布等莫不如此。如是，本文讨论的钱文到底是“安阳”抑或“阳安”呢？

1. “安阳”说

裘锡圭认为古代以安阳为名的地方很多，除中原外，燕国境内也有安阳。《水经·滹水注》：“又东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阳山……又南迳安阳亭东。《晋书地道记》曰：蒲阴县有安阳关，盖安阳关都尉治。世俗名斯川为安阳圻”。安阳亭、安阳关、安阳圻等名称，都在揭示这一带在古代一定有过以安阳为名的城邑。安阳关故址在今河北省完县西北，跟燕邑曲逆、唐等故址极近，它所从得名的安阳在战国时代也应该是燕邑。这个安阳大概就是燕国安阳布的铸造地。⑤

何琳仪认为赵国有东西两个安阳，据《汉书·地理志》东安阳隶属于代郡，西安阳隶属于五原郡。一般认为东安阳为三孔布币的铸地，西安阳为方足布币的铸地。燕方足布“安阳”与赵三孔布“安阳”疑本为一地，即代郡所辖东安阳。顾观光云“东安阳，《汉志》属代郡。《水经·灤水注》引《地理风俗记》曰，五原有西安阳，故此加东也。《史记》惠文王三年，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正义》引《括地志》云，东安阳故城在朔州定襄县界（今宣化府蔚州东北一百里）。东安阳战国属代郡，一般说来应属赵国，但也可

2) 马 昂，《货布文字考》，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3)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清嘉庆年间刊本。

4) 戴志强戴越，《燕布与楚布》，《中国钱币》6，2014年。

5)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8年。

能一度属燕国。检《战国策·燕策一》“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鲍彪注“西有上谷、代郡、雁门”。或以为上引《燕策》为苏秦“夸词，非实也”。又检《汉书·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据上引可知，代郡、雁门一度属赵，也一度属燕。代郡与上谷接壤，与赵都邯郸又间隔中山国，一度被燕所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战国时期各国边邑屡易其主，不但史书记载不绝如缕，而且在货钱文字中也有所反映，因此，将赵三孔布与燕方足布的“安阳”视为一地，并不足为奇。总之，东安阳在今河北阳原东南，战国一度属赵，也一度属燕，是赵“安阳”三孔布和燕“安阳”方足布的共同铸造地。⁶⁾

对于何琳仪提出的观点，吴良宝经研究考证提出了否定主张，认为裘锡圭的说法是目前最为可信的解释。⁷⁾至于燕国安阳的具体地望在哪里，只有等待更多的材料出现以后才能确定。⁸⁾

冯括认为至今所发现的燕国双字布币当中还不见有左读的现象，认为释读“阳安”是不可信的。指出实际上完县一带的燕安阳布出土量远不及河北北部至辽宁一带，裘锡圭说与何琳仪说均有待商榷。由于燕国核心区域出土的“双字燕布”中仅有燕安阳一种，再参照燕安阳布的总体出土情况，认为约铸于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南麓一带，但不排除燕根本没有“安阳”城、燕安阳布在多地有铸造的可能性。⁹⁾

2. “阳安”说

《水经·滹水注》有“安阳亭”、“安阳圻”、“安阳关”，王先谦据“官本”均改作“阳安”。¹⁰⁾清代学者杨守敬对此曾有过解释，“赵改安阳作阳安，下同，云：以《郡国志》校正。《汉书·王子侯表》有易安侯平，赵敬肃王子，武帝元朔元年封，即此阳安也。而世本俱误作易安，非矣。戴改作阳安。守敬按：《地形志》，蒲阴有安阳亭，指此安阳，与《注》文合。又《元和志》，安阳故关在北平县西北二十五里。《新唐志》，北平县西北有安阳故关。然则《郡国志》注作阳安，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仍作“安阳”。¹¹⁾但“阳安”说确实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其成说的依据。

1976年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水泉村村民在挖土积肥过程中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存。1977、1978年辽宁省博物馆与朝阳市博物馆联合对水泉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灰坑、窖穴、窑址、墓葬等300多个遗迹，出土文物3000余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发现了一件有“阳安都王氏鈇”铭陶片，¹²⁾似为一罐形陶器的肩部碎片，字痕下凹，为长条形竖向排列，存一残耳，铭纹钤印于耳旁(参见图1:1)。该遗址的下层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层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上层为战国时期文化层，该陶片即出土于战国文

6) 何琳仪,「燕国布币考」,『中国钱币』2,1992年。

7) 吴良宝,「燕国安阳布币考辨」,『北京文博』2,2000年。

8) 吴良宝,「燕国安阳布币补说」,『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7,2006年。

9) 冯括,「燕系方足布产生年代及流通情况考辨」,『中国钱币』5,2015年。

10)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11。

11)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12) 徐秉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2,1992年。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2,1986年。

化层中。对此铭文，释者多有歧义：何琳仪释为“阳安都王符瑞”，¹³⁾ 吴良宝释为“阳安都王勺鐏”，¹⁴⁾ 王成生释为“阳安都王伏(司)鐏”，¹⁵⁾ 虽然如此，就阳安作为一个地名这点，众说并无异义，徐秉琨则进一步指出，阳安地望就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一带。



图1 陶铭资料
1. “阳安都” 2. 辽阳三道壕 3. “白庚都” 4. “西城都” 5. “且虑都”

13) 何琳仪, 「燕国布币考」, 『中国钱币』2, 1992年.

14) 吴良宝, 「燕国安阳布币考辨」, 『北京文博』2, 2000年.

15) 王成生, 「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 『辽海文物学刊』2, 1997年.

3. 关于“××都”的问题

“××都”问题亦见史载。《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礼》成书于战国，由此可知战国时期的“都”是大于县而小于郡的行政区划单位。

学界诸多学者都曾对战国时期郡县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赵平安认为，战国时期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县字。¹⁶⁾ 鲁鑫认为在燕国官玺中“某都某”格式中的“都”之前所缀者均为地名，从地名性质判断应当为燕国某县。由此不仅近30个具体县名可据此得知，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县属机构和职官名称。¹⁷⁾ 后晓荣认为燕国地方行政区划并非称“县”而称“都”，“都”是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单位。¹⁸⁾ 燕国设置相当于县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的“都”，包括燕北五郡在内，目前确知可考的有40处之多。¹⁹⁾

辽宁地区考古发掘曾出土若干相关资料，兹作介绍，并试作分析：

资料1，“……王氏鉢”铭陶片²⁰⁾：1件。1955年辽阳三道壕遗址出土。该遗址为西汉初期村落遗址，遗址下层有零星战国文物出土。该陶铭钤印在一个很小的陶片上，由于陶片很小，无法确知陶器原形。陶片为方角，略似梯形，铭纹处无纹饰。铭记以长条形戳记钤印在陶器外壁，字痕为阴文，可知戳记的文字原应是凸起的阳文(参见图1：2)。

资料2，“白庚都王氏鉢”铭陶壶²¹⁾：1件。铭记钤印于陶器肩部，字痕下凹，为长条形竖向排列。上世纪70年代出土于喀左县兴隆庄二步尺村小湾战国遗址。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深达3米，曾出土战国时期刀币150余公斤。陶壶为泥质灰陶，平沿，束颈，鼓腹，平底稍内凹，颈和上腹部有弦纹，下腹部和底有细绳纹，肩部横向排列有四个乳钉。颈内壁有凸棱标准线，自口沿至颈中部，长3.5厘米。下半部似还有一条，壁上存有痕迹。口沿直径为16.5、口径21、最大腹径25、底径12、高25厘米，为战国时期燕国制作的陶量(参见图1：3)。现收藏于喀左县博物馆。对于该陶铭的释读，有“白庚”，“白唐”两种观点，²²⁾ 本文暂且遵从《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释为“白庚”。

资料3，“西城都王氏鉢”铭陶壶²³⁾：共2件。铭记内容相同，皆钤印于陶器肩部，字痕下凹，为长条形竖向排列。但2个铭记稍有差别，并非出于同一戳印。两壶均为1981年朝阳袁台子战国墓出土。该墓为单人葬土坑墓，墓葬所在为战国至汉代墓群。陶壶形制大体一致：为泥质灰陶，平沿，束颈，球腹，平底。颈和上腹部饰有弦纹，腹的下半部和底饰有细绳纹，肩部横向排列3乳钉。颈内壁有凸棱标准线，自口沿至颈根部，长6.8厘米。口沿直径19.5、口径14.4、最大腹径24、底径13、高25.5厘米。应为战国时期燕国制作的陶量(参见图1：4)。现收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16) 赵平安，「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袁’(县)字」，《语言研究》12，2006年。

17) 鲁鑫，「东周郡县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8) 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2007年。

19) 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文物出版社，2013年。

20) 徐秉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2，1992年。

21) 同上。

22) 方殿春，「西汉平刚故址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辽海出版社，2007年。

23) 徐秉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2，1992年。

资料4.“且虑都市王伏(司)鏞”铭陶壶²⁴⁾：1件。铭记铃印于陶器肩部，字痕下凹，为长条形竖向排列。1972年6月出土于葫芦岛市连山区邵集屯镇英房村。该处为邵集屯古城址所在地。邵集屯古城由小荒地山城、小荒地地方城、英房城、浑酒沟城等组成。四个古城相隔不远，年代相近，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整体。城址出土遗物显示，小荒地地方城与英房城时代为战国至汉代、浑酒沟城时代为汉代。值得关注的是，英房村不仅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且虑都”陶壶，而且该村还曾出土过战国刀币700余枚。陶壶为泥质灰陶，大平口沿，束颈溜肩，鼓腹，平底稍内凹，颈到腹中部施有弦纹，以下为斜向细绳纹。肩部横向排列4个乳钉。颈内壁有一竖条凸棱，上自平沿，下至颈的根部，长5.6、器高28、外口径26、底径18.4厘米。应为战国时期燕国制作的陶量(参见图1：5)。现收藏于锦州市博物馆。

资料5.“阳安都王氏鉢”铭陶片已见前述，不赘。

上述资料有一共同的特征，即陶铭中都有“××都王氏鉢”字样。徐秉琨曾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 ① 铭文中的文字皆属战国文字，因而这些资料的时代也均为战国时期。
- ② “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城邑的单位名称。
- ③ “西城都”、“白庚都”、“阳安都”均为战国时期城邑。“西城都”后为汉代的柳城县，属辽西郡；“白庚都”后为汉代的白狼县，属右北平郡；“阳安都”可能是一座位于右北平郡与辽西郡两个邻郡交接处附近的城邑，可能与文献记载的“阳乐”有一定关系。
- ④ 根据四种陶铭体例一致，但分别出土于辽东、辽西、右北平等不同郡域内的情况，认为“××都王氏鉢”应该是燕国北方地区统一颁布的用于陶铭的定式，并进一步指出“王氏”可能与王室有关，应该是一种有关制陶业的中央驻在地方的管理机构，或者是官营制陶业中针对生产、管理、检验、批准当地陶业生产的管理机构。

虽然资料4的陶铭中多了一个“市”字，对于“氏”字释读为“伏”、“鉢”为“鏞”，仍有分歧，但从总体格式角度观察，其铭文涵义属相同性质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王成生考证“且虑都”也为战国时期城邑，位于今葫芦岛市的邵集屯古城址，后为汉代的且虑县，属辽西郡。虽然对于管理机构的主体是中央王室还是地方官府存在不同的见解²⁵⁾但他们对该管理机构为官营而非民营的认识还是一致的。

徐秉琨能够对辽宁地区难成系统的零散材料进行比对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如此重要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其逻辑分析丝丝入扣，得出的结论也是极具说服力的。之所以重要，是其不仅考证出“西城都”、“白庚都”、“阳安都”等都为战国时期城邑，且均为郡治以外城邑的情况，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城邑中还存在着官营制陶业的管理机构这一重要事实。

众所周知，制陶业是一个有着诸多繁杂工序的行业：从选矿采掘到筛选加工、从原料运输到入窑烧造、从生产监督到成品检验、从装卸运输到安全保障都需要众多具有相关职能部门的通力配合才能顺

24) 王成生，「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辽海文物学刊》2，1997年。

25) 王成生，「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辽海文物学刊》2，1997年。

利完成，而能够组织起这些职能部门的，则非政府或是具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的机构不可。很难想象一个应该具有一定规模的官营制陶作坊与具有这些职能的官僚机构会位于乡里鄙野之地或小城市之中。一个国家在制定和颁布一项制度时，一定是具有着全面性和连贯性的特点，从不同郡域发现有着同样体例陶铭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不论是文献史料的记载，还是对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均表明战国时期燕国的“都”是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可能性是较大的，即便不等同于县，至少也是当时的重镇无疑。由此可推知阳安都的重要地位。

Ⅲ. 关于钱文的读序问题

对于该布币，以往多称“安阳”布，徐秉琨在《说“安阳”布》一文中依据“阳安都”陶铭资料，指出与该陶铭中字体一致的此类布币(图2:3)应称为“阳安”布。有些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主张仍应该按照从右至左的惯例释读为“安阳”为宜²⁶⁾但此种惯例也并非绝对。《中国古钱谱》中就同时收录有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释读为“平阳”的布币²⁷⁾；《古钱大辞典》中也收录有左字为半右字为两和右字为半左字为两的半两钱²⁸⁾该种实例尚不止此。

此外，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1975年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上瓦房乡大西沟门村修水渠时，在距地表2米深的土层中曾发现一扇燕国“一化”圜钱的铅质范模，民工们误认为是白银而将其砸碎分掉。1981年，参与当年分割钱模的民工薛占芳将其所分得的一块送交旗文化馆文物组，此范模现藏于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

据实地考察，钱范出土地在旗所在地锦山镇西南约60华里的上瓦房乡大西沟门村东约半华里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平台地上，东距锡伯河300米，高于河岸5米左右，西距黄土山约80米。遗址东西长80、南北宽约50米，赤承公路从遗址中间穿过。地表遗有泥质灰陶的豆盘、豆把和绳弦纹陶罐及鱼骨盆等残片，这些均属战国时代遗物，知该遗址为战国时期遗址。原范模形状已不清楚，观察可知是整个范模的右下角部分，残高8、宽7.5、厚1厘米，为一铅质母范。范面铸有凸起的“一化”钱模，现存三排。右两排相连为同一浇口，中间有一道条状沟和相对的两条分沟相连通。两分沟略呈八字形通往每个钱模，应是铸钱时注入铜水的通道。左一排当属另一浇口。中间一排存有钱模三枚，其它两排各存钱模两枚。此“一化”钱模均有外郭方穿，钱径1.7、穿径0.7厘米。中间一排底部一枚钱模上的“一”字在下，“化”字在上，其余两枚均“化”字在下，“一”字在上，钱与钱的间距为0.4厘米。多位专家考证认定，“一化”圜钱应

26) 吴良宝，「燕国安阳布币考辨」，《北京文博》2，2000年。

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7) 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64-65页。

28) 丁福宝，『古钱大辞典』(全二册)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782页。

是战国后期燕王喜迁居辽东之后的铸币，这次发现的战国铅质范模，是当时燕国制作“一化”圆钱的母范(参见图2:1)，说明战国晚期在这里设立过铸造“一化”圆钱的铸币机构或作坊。报告中指出，北京地区虽属燕国都城，但此种钱币未见出土，仅东北地区少有发现，证明燕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使用铅制范模铸造货币了，比以前直接刻制石范、陶范、铜范或用钱币原形压印去制作泥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制范铸钱的效率，应是当时制范铸币工艺中一个创举。²⁹⁾

从以上所举《中国古钱谱》与《古钱大辞典》中的实例以及赤峰地区喀喇沁旗发现燕国“一化”圆钱的铅质范模来看，笔者认为可作两种解释：① 由右至左的释读惯例可能有一个较长的约定俗成过程，战国时期可能尚未完全定型；② 即便战国时期已经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范式，因为管理尚不严格，执行尚不规范，所以同时存在从左至右和从右至左两种释读方式。故而仅以释读惯例来否定“阳安”读序的主张还显牵强。特别是出土资料切实确凿，陶铭文字为竖向排列，由横排容易导致的读序纠结尽可排除，因此，“阳安”的读序可成定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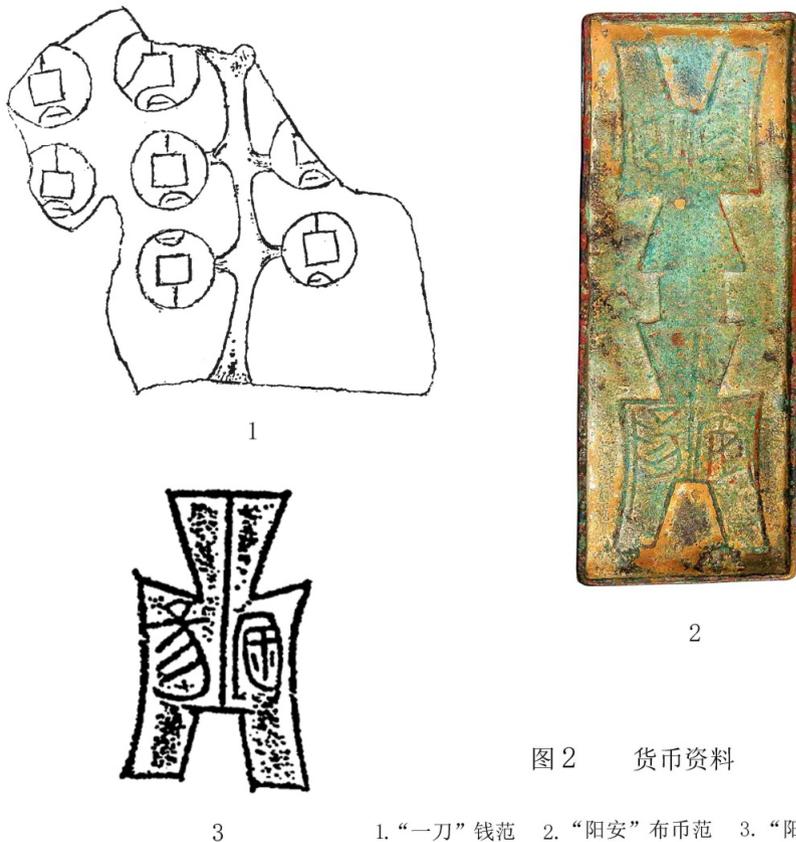


图2 货币资料

1. “一化”钱范 2. “阳安”布币范 3. “阳安”布币拓片

²⁹⁾ 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喀喇沁旗发现的一块铅质钱范」，《内蒙古金融研究》1，2003年。

IV. 关于铸币地的问题

关于该布币铸于何地的问题，笔者认同徐秉琨的观点，即该类布币当铸于“阳安”所在地区。理由如下：

① 对于“阳安”地望的推断主要是参考相关文献记载而来，但这些文献多为后世所记，而记载的时间与所记录的战国时代又相距甚远，且经秦代的“焚书坑儒”，加之此后的长期战乱，很难保证这些史料记载详实无误，这也是造成先秦部分史料错误之处尤多的客观因素。

② 不论是裘锡圭还是何琳仪，在考证“阳安”地望时所能参考的史料极其有限，且所参考的史料多为不同时代所著，很难保证其所指向的为同一事物而没有任何变化，对于地望的认定也缺乏类似等级、规模等可参考的客观因素，主观臆测成分较大。

③ 徐秉琨的主张则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为基础，通过对“阳安”二字的释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铸币形制的特点比较、钱币流通和分布的主要范围，结合出土于朝阳建平地区的“阳安都王氏鉢”陶铭，提出此类布币当铸于“阳安都”的观点更为客观，更具说服力。

近年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古代辽宁》展览中，展出了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布币的钱范。据该馆的图录介绍，此范出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具体出土时间与地点不详。该钱范为长方形，四边起棱，中间内凹，上下各铸有一个从左至右为“阳安”二字的布币范模。长10.1、宽3.6、厚约0.6厘米。为青铜质地。图录指出，这是制作“阳安”布币钱范的一合，应还有另外一合与之相扣，为制作钱范的范模³⁰⁾(参见图2:2)。可见在这一地区铸行并流通使用了该布币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由于图录中并没有指出这一钱范的国别，更没有提出将其铭文释读为“阳安”的任何依据。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以讨论。

① 国别定性。发现钱模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北部，战国秦汉时期其地所当则有辽西郡或右北平郡地两种可能。就目前可见资料，战国时期仅燕国有向东北地区拓地的记录，由此可知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期(中后期)属燕国之地。

布币主要是战国时期流通使用的青铜铸币，虽王莽复古也曾铸造并流通过布币，但不论是布币铸型，还是钱文形制，均与战国布币迥异。阜新出土布币钱范多具战国特征，其时代当为战国时期无疑。

战国时期布币主要有“三晋”布币与燕国布币之分。由于铸造钱币是一种国家行为，有着严格的生产、监督制度和管理体系，因此只能官铸，地方及民间是不能任意铸造钱币的。各国也只能铸造本国货币，绝不可能舍弃本国货币而去铸造其它国家钱币。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铤而走险的钱币私铸行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既然是私铸行为，是必然会受到官府的严厉打击和制裁取缔的。因此，私铸行为自然要尽可能的做到暗地铸造以规避风险。私铸货币的目的就在于将私

30) 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文物出版社，2017年。
童立红，《蒙古贞文物集萃》，辽宁大学出版社，2016年。

铸的货币进行流通和使用，以此获利。货币的流通及使用范围又是多以铸币的本地、本国，以及以此为中心所能辐射到的周边地区为主。而发现该钱范的阜新地区为燕国位于辽西地区的一个边郡，与其接壤的多为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或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山地民族，基本上不与其它中原的各诸侯国接壤。可见即便存在与周边地区进行交易的行为，其它各国货币的数量只可能是极少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本地突然出现大量的它国货币流通使用的现象，当然会引起官府的关注。因此，不论是出于流通使用，还是保障安全规避风险来看，即便存在私铸行为，也不可能冒着风险去铸造其它国家的货币。可见，在该地区不论是官铸还是私铸，出现铸造其它国家货币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这一青铜质布币钱范是由其它地区携带而来的可能性，但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当为燕国布币的钱范。

②“阳安”布还是“安阳”布。从古文字的角度分析，图2：2与图2：3钱文并非完全相同。图2：2中的阳字比图2：3中的阳字多出了一个左边的行旁。古文字学常识告诉我们，行旁的有无，以及行旁于左抑或于右；两个安字口符内部的些许差异，对古文字的表意并无妨碍。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学界多将并非完全相同的两字仍释读为“阳”字与“安”字。

假如图2：2确为“安阳”布币的钱范，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燕国既有安阳，也有阳安之地。试想在战国时期古文字还不够丰富和发达，且对于古文字认知的普及率不可能高的情况下，是很容易造成混乱的。战国时期燕国主要流通的币种为刀币，布币没有刀币普遍。但燕国却在方足小布中铸行此类双字货币，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引起的混淆，这也是非常不利于燕国监督与管理的。尤其是“阳安都”的陶铭与该钱范均仅发现于辽西地区的事实表明，阳安与安阳均出现于辽西地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以往将此类布币称之为“安阳”布的依据仅为钱文读序的惯例，以及主观臆测成分极大的“安阳”地望说。由此，笔者认为上述的布币钱范当为阳安布币的钱范。

V. 结 语

本稿主要对左字为阳，右字为安的燕国双字布币进行了研究。

“××都”建制问题是本文讨论的切入点，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确信辽宁地区发现的“××都”均为战国时期城邑，且均属郡治以外的城邑，表明作为当时社会经济与民生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是官营制陶业管理机构的主要标志。结合“××都”应该是相当于县一级的相关研究成果，突显了“阳安”都的重要地位。也只有这样的重镇，才可能具备铸造钱币的可能。从而为进一步推导“阳安”而非“安阳”的考论奠定了基础。在区位分析中，认为“阳安都”当为燕国位于辽西地区的一座重要城邑。本文否定了仅以释读惯例来判定币文读序的传统观念，以确凿的出土资料实例，证明了“阳安”币文读序的正确性。

在对各种可能因素的辨析之后，本文根据“阳安都”陶铭与该钱范的发现均仅限于辽西地区这一确凿

事实，强调了青铜质布币钱范当为燕国钱范的观点。藉以考古发现的实物，通过对“阳安”二字的释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铸币形制的特点比较、钱币流通和分布的主要范围等因素的反复研判，因而在肯定“阳安都”为燕地建制的前提下，排除了可能造成混淆的阳安与安阳均在燕地(尤其是位于辽西地区)的可能。

虽然对于该类布币目前仍存在到底为“阳安”布还是“安阳”布仍有争议，但通过对官营制陶机构的考证、钱范制作地望问题的比较、钱文读序问题的考论、国别定性问题的探讨等，认为将该类布币称为“阳安”布是较为妥当的。

包括燕国布币在内的古钱币是历史文明最忠实的见证者，在方寸间记录下了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文明传承，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以其悠久而深远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意义而倍受关注。货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支撑，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战国燕“阳安”布币文的研究，涉及燕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建制、文字等多方面问题。因此，尽管本文讨论所及虽仅限于钱币研究范畴，但却使我们能够越发了解到隐藏其币文背后的文化内涵，“阳安”币文的释读与考证，对研究战国时期燕国的经济发展、对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类别与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进而对于燕国向东北地区的扩展及统治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清嘉庆年间刊本。
- 戴志强戴越，「燕布与楚布」，《中国钱币》6，2014年。
- 丁福宝，《古钱大辞典》(全二册)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 方殿春，「西汉平刚故址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辽海出版社，2007年。
- 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冯 括，「燕系方足布产生年代及流通情况考辨」，《中国钱币》5，2015年。
- 何琳仪，「燕国布币考」，《中国钱币》2，1992年。
- 后晓荣陈晓飞，「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2007年。
- 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文物出版社，2013年。
- 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喀喇沁旗发现的一块铅质钱范」，《内蒙古金融研究》1，2003年。
- 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文物出版社，2017年。
-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2，1986年。
- 鲁 鑫，「东周郡县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马 昂，《货布文字考》，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十二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8年。

- 童立红, 『蒙古贞文物集萃』,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6年.
- 王成生, 「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 『辽海文物学刊』 2, 1997年.
- 王谦先, 『合校水经注』 卷11.
- 吴良宝, 「燕国安阳布币考辨」, 『北京文博』 2, 2000年.
- 吴良宝, 『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 吴良宝, 「燕国安阳布币补说」, 『内蒙古金融研究』 钱币文集7, 2006年.
- 徐秉琨, 「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 『辽海文物学刊』 2, 1992年.
- 杨守敬熊会贞, 『水经注疏』,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年.
- 张崇懿, 『钱志新编』, 1830(清道光十年) 年酌春堂藏刻本.
- 赵平安, 「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袁’ (县) 字」, 『语言研究』 12, 2006年.

* 이 논문은 2022년 3월 10일에 투고되어,
 2022년 3월 21일에 심사위원을 확정하고,
 2022년 4월 5일까지 심사하고,
 2022년 4월 11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국문요약

“양안포” 소의

이 광 명*

하북성, 북경과 천진지역, 내몽고, 요녕성, 한반도 북부 등 지역에서 발견된 많은 청동화폐중에 좌측은 양(阳)자 우측은 안(安)자로 된 쌍자포폐(双字布币)가 있는데 “삼진(三晋)” 포폐와 연국포폐로 나눌수 있다. “삼진” 포폐는 대다수 삼공방족포(三孔方足布)로 되어 있어 기형과 전문(钱文) 서법으로 보면 모두 연국포폐와 많이 다르다. 따라서 본고에서는 이런 연국포폐에만 대해 검토하고자 한다. 지금까지 이런 포폐에 대하여 도대체 “안양(安阳)”포인가 아니면 “양안(阳安)”포인가 라는 논쟁이 존재하고 있다.

본고에서는 지망(地望) 문제에 대한 비교, 전문석독순서에 대한 고증, 국별(国别) 성격문제에 대한 검토 등을 통해 “안양”포 라고 석독한 이왕의 관점에 논거면에서 충분하지 못 하다고 생각된다. 따라서 고고발굴을 통해 얻은 객관적인 실물자료를 기반으로 구체적인 분석과 고증을 거쳐 이런 포폐를 “양안”포 라고 석독하는 것이 비교적 타당하다고 생각된다. 이에 대한 검토는 전국시기 연국의 경제발전 및 이 지역에 대한 연국의 행정구역 설치등 여러 문제를 연구하는데 매우 중요한 단서로 될수 있을 뿐만아니라 나아가 연국이 동북지역으로 확장하고 통치하는 문제를 연구하는데에도 매우 중대한 의미가 있다.

[주제어] 전국시기, 연국, 방족포폐, 양안, 안양

* 중국요녕성문물고고연구소

Abstract**Discussion on Spade-shaped Coin of “Yangan”**

Li, Guangming*

Among the bronze coi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unearthed in Hebei, Beijing-Tianjin area,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re is a two-character spade-shaped coin with the money text “Yang” on the left and “An” on the right. Whether from the shape of the coin or the calligraphy of the tex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on the spade-shaped coin between the states of Han, Wei, Zhao and Yan state. This discussion is focus on the spade-shaped coins of Yan state. The controversy is the texts on the coin should be called Yangan or Anya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roof for calling this type of spade-shaped currency “Anyang” is not sufficien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reading order of the texts, and the discussion on which the coin belongs to.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ed data,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oin should be called “Yangan Bi”. This conclusion provided a very important c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f Ya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of this area, and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expansion and reign of the State of Yan to the Northeast of China.

[Keywords] Warring States Period, Yan State, spade-shaped coins, Yang’an, Anyang

* Liaoni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